

苏区红色歌谣的思想起源

肖露伟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天津 300387

DOI:10.61369/SE.2026060045

摘 要：红色歌谣作为近代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载体，对于苏区的发展壮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中央苏区时期，苏区政府依托赣南、闽西农村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并建立起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了应对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苏区政府利用红色歌谣对政权理念进行宣传。红色歌谣的主要类型涵盖歌颂政权、土地改革、反抗封建剥削三个方面，是推动中央苏区不断纠错、成长和壮大的重大举措，深刻影响了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和革命事业的走向。

关 键 词：红色歌谣；思想政治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Red Songs from the Soviet Area

Xiao Luwe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Abstract：Red ballads,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medium in modern histor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areas.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the Soviet government relied on the rural bases in southern Jiangxi and western Fujian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such as land reform and armed struggle, and established the Chinese Soviet Provisional Central Governm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oviet government used red ballads to promote its political ideas in difficult conditions. The main types of red ballads cover praising the government, land reform, and resisting feudal exploitation, which were significant moves in help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o continuously correct mistakes, grow, and strengthen, deeply affecting the trajectory of modern history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Keywords：red songs; ideological politics

红色歌谣苏区是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发端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孕育于赣南、闽西客家山歌的土壤上，是中央苏区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彰显着先辈们顽强拼搏、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内涵，其独特价值需要得到深入挖掘。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简称，是苏区政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赣南、闽西创建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形成时间可追溯到1929年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阶段，直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与中央政府所在地，标志着中央苏区的正式形成。中央苏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政权体系最完整和影响最深远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在鼎盛时期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50余万，下辖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1]在1934年10月，

第五次反围剿行动失败后，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开始进行战略转移，苏区的主体部分丧失，中央苏区时期至此结束。

（二）红色歌谣

“红色歌谣”泛指苏区政府成立以来，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特定类型的歌曲，^[2]是苏区政府领导人民在革命实践中依托传统民间山歌、民谣和小调进行改编或原创的文艺形式。学界将红色歌谣的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在广义层面中将五四运动以来，一切以歌颂共产党、民族和人民的民间歌谣、群众歌曲都称为红色歌谣。在狭义层面中，红色歌谣特指土地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中的工农群众以及红军队伍共同改编和创作的革命民谣和山歌为红色歌谣，又称苏区革命歌谣。^[3]1934年中央苏区官方编撰的《革命歌谣集》是最早的红色歌谣汇编文献，内容涵盖了控诉封建剥削、宣传土地革命、歌颂党

作者简介：肖露伟（2000-），男，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

和红军、动员参军参战等苏区活动，典型曲目有《苏区干部好作风》《红军打来了晴天》《十送红军》等。

（三）政治功能

政治功能是指在政治体系中，组织或机构通过其活动和决策，影响和引导社会行为、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是党组织和其他政治功能机构的基本功能之一。政治功能一词的最早理论源头可追溯至1900年美国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的著作《政治与行政：政府研究》，在这一著作中，弗兰克提出国家的政治与行政两大核心职能分离的理论，认为政治功能是表达国家意志的领域，包含政党竞选、立法、舆论动员和阶级利益整合。^[4]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将帕森斯社会学理论移植进入政治学中，对政治功能进行标准化的学术定义，指出政治功能是一切政治结构对政治系统存续、运行产生的客观作用，并且首次提出文化载体具备政治功能的观点。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明确提出传播媒介的政治功能包含意识形态教化、社会协调、政治动员，直接适用于文艺、歌谣等文化载体研究。^[5]

二、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歌谣创作的历史背景

“各种艺术品都有属于它的时代和民族，各有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及它的观念和目的。”^[6]中央苏区时期的红色歌谣是诞生于地域文化、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土地革命实践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列宁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和早期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为内核，以赣南闽西地区发达的客家民间山歌为艺术载体，生动展示了封建压迫下底层民众在苏区政府的带领下反抗阶级剥削以及对苏区政府的爱戴之情。

（一）理论基础

红色歌谣作为文艺的一部分，展现出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和为自身及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的自觉性。对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歌谣的政治功能的研究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服务于革命的论述以及苏区政府早期领导人对革命宣传的探索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作为苏区政府在苏区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武器，其创作的根本理论源头应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文艺思想既有相同的理论内核也有不同的研究理念。马克思与恩格斯文艺思想相同的理论内核是指二者的思想都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都具有显著的阶级性与人民性。马克思与恩格斯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将文学艺术规划为社会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指出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经济基础与物质生成方式决定所决定的。^[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将艺术与法律、政治、宗教、哲学一并视作观念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并且在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论述中，不仅指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道路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还进一步指出文艺创作应当反映历史前进的方向，特别是要

着力描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活与斗争。^[8]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艺思想虽有着共同的理论内核，但二人的研究侧重、问题视角、论述重心存在清晰分野。马克思立足政治经济学提出“艺术生产”^[9]的核心理念，具体表现为经济制度如何决定文艺的生产、流通与价值，以资本、分工、物质生产为切入点，将文艺视作特殊的精神生产，把艺术放置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下考察。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重点剖析物质生产方式如何制约艺术发展，以古希腊神话、史诗为例说明特定经济形态才能孕育独特艺术形式，同时批判资本主义将艺术商品化、艺术家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异化现象。恩格斯立足唯物史观的上层建筑理论提出著名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10]，不局限于经济维度，强调政治、阶级斗争、社会思潮、道德风俗共同塑造文学，侧重文艺与社会、阶级的辩证关系。恩格斯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为核心样本，提出这是现实主义文艺的伟大胜利，又针对《城市姑娘》明确界定现实主义核心标准，其论述强调文艺作品除细节真实外，当注重思想内容同表现形式的完美结合，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用生动、自然的艺术形式表达作品的倾向。^[11]在无产阶级文艺的内容方面，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进步的作家和诗人应当是进步思想和革命斗争的喉舌，应当歌颂倔强的、威严的和革命的无产者。”^[12]

（三）列宁社会主义文艺思想

列宁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在20世纪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影响了先进知识分子领导下的中国文艺思想。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沙皇政府的斗争中，积极发挥革命文艺的宣传动员作用，在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其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框架趋于完善。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宣扬无党派文学，试图掩盖文艺的阶级属性。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对资产阶级的宣扬进行抨击，并且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13]在列宁的观点中，无产阶级文艺必须坚持党性的原则，不存在脱离阶级的中立创作，党的一切报刊、文艺机构应自觉地为无产阶级服务，必须承认党的纲领、服从党的组织。无产阶级的文艺就如同武器一样，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发挥文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正如列宁称《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狄埃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14]，充分肯定《国际歌》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传播效应，指出：“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15]列宁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批判了文化领域的“去意识形态化”“纯客观中立”的虚伪论调，奠定了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根本准则，深刻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制度。

（四）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人的文艺思想

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人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社会主

文艺思想与五四运动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歌谣以及苏区群众文艺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下的五四运动中，文化革命也是浪潮的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史观和文艺具有鲜明阶级属性的阶级学说改造旧文艺。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人承接列宁关于文艺的党性原则思想，将文艺视作是唤醒民众，组织群众配合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首先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陈独秀在《革命文学论》一文中提出：“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16]李大钊借用唯物史观批判只为封建贵族服务的旧文学，提出立足平民的新文学。在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后，以邓中夏、挥代英、肖楚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文艺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就文艺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开展了重要论述。邓中夏撰写《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文中呼吁文学是“唤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

勇气^[17]的工具。肖楚女在《艺术与生活》从文艺最基本的问题出发，考察了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他指出“只可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18]

论及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人的文艺思想离不开中国的左翼文学，而中国左翼文学则离不开瞿秋白。瞿秋白作为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人，是较早提出文学大众化问题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中对旧文艺进行反思，“忽视这种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任务，正是以前革命的文学界空谈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而没有切实斗争的最大原因。”^[19]在认识到文艺事业的问题之后，瞿秋白随之指出革命文艺“首先要说明的是：革命的先锋队不应当离开群众的队伍，而自己单独去成就什么‘英雄的高尚的事业’。”^[20]除此之外，蒋光慈作为留苏回国的共产党员，他指出：“无产阶级亦与其他阶级一样，在共产主义未实现以前，当然能够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21]

参考文献

-
- [1] 石仲泉. 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 [J]. 中共党史研究, 2006, (1): 77-86.
- [2] 王焰安. 红色歌谣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第3页.
- [3] 陆耀东编《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99页.
- [4] (美) 弗兰克·古德诺：《政治与行政——政府之研究》，丰俊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5] (美) 赖特：《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M]. 1959.
- [6] (德)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 美学第1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4月，第3页.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9页.
-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4月，第32页.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443页.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9页.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5页.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第663页.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第302页.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第303页.
- [16]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204页.
- [17] 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326页.
- [18] 肖楚女：《艺术与生活》，《中国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
- [19]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491页.
- [20]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494页.
- [21] 蒋侠僧：《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